背着烈士遗孤长征的开国将军马泽迎

在长征途中，有一个人没当过“新郎”甚至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便当起了爸爸，背着孩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他就是开国将军马泽迎，那个孩子是他根本不认识的烈士的遗孤，最终被他抚养成人。

马泽迎（1912-1974），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人。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任红三军第三师炮兵连班长，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连指导员，师直属队总支书记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。参加了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陕甘宁边区骑兵团政治委员，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第十大队政治委员，第二十一团政治委员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，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，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，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冀中第六军分区司令员，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，独立第七旅政治委员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政治委员，第二〇六师政治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委员，海军西营基地政治委员，军副政治委员，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荣获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。

马泽迎。

烈士托孤

1934年初冬，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卫生队指导员的马泽迎，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路。

红军在四渡赤水时，仗打得异常激烈，双方伤亡很大。一日黄昏，两位苗族妇女把一名红军伤员抬到团部卫生队，她们放下伤员，一边比手画足，一边呜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。因不懂苗语，马泽迎一直不知她们在说些什么。后见她们从伤员怀里抱出个不满周岁的婴儿，有点奇怪，带着孩子的伤员不是女红军，而是一位男同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马泽迎觉得一头雾水。

正在这时，恰巧红军总司令朱德路过。见状后，立刻从附近叫来一个懂汉语的苗族战士，经过他的翻译，大家才知道婴儿是伤员的孩子，孩子的妈妈是红军的宣传员，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父亲带着婴儿，在战斗中又不幸受了重伤。

伤员是胸部中弹，血流不止，一直处在昏迷状态。朱德命令马泽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全力抢救。不久，伤员睁开眼睛，微动着嘴唇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。朱德和马泽迎俯下身，才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同志，我不行了，孩子交给……托你……做孩子的……”话未说完便咽了气，但那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却直盯着马泽迎，不肯闭上。

朱德和马泽迎帮烈士合上双眼，向烈士遗体行了军礼后，朱德对马泽迎说：“你可明白这位烈士的意思，是否知道他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出的那个字？”

马泽迎悲痛地点了点头：“是个‘爸’字。”

朱德含着眼泪继续说道：“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，孩子父亲委托你，我也把这孩子交给你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孩子的爸爸，你必须把他带好！”

“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孩子尽到父亲的责任，对得起死去的烈士，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。”马泽迎坚定地从朱德手中接过婴儿，紧紧地抱在怀中。

背孤长征

此后，行军打仗、抢救伤员时，马泽迎的背便成了婴儿的摇篮。孩子拉屎撒尿都在他背上，时间长了，孩子胯下湿疹严重，马泽迎背上也长出了巴掌大的脓疮。宿营时，马泽迎把孩子搂在怀里，疼爱有加。为了孩子，马泽迎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干粮，一口口嚼烂，然后嘴对嘴地为孩子喂食，还常常给孩子把屎把尿，洗晾尿布。过雪山时，马泽迎怕孩子冻坏，便拆开自己的棉袄掏出棉花，给孩子亲手缝了件厚厚的小棉衣。要知道，这一切对一个未婚，甚至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子，是多么的艰难。

有的同志曾好心提醒马泽迎，不如找个合适人家，把孩子寄送掉。可马泽迎觉得必须对得起死去的同志，对得起自己的承诺，再苦再累，也应当无条件地扛着。更何况，当时大多数时间都是行进在渺无人烟的雪山草地，偶尔有一些人家，也是言语不通的少数民族，的确找不到可依赖的人家寄送，马泽迎实在放心不下。

朱德也对孩子非常牵挂，经常为孩子送点红薯干、玉米粉等，帮助马泽迎喂养孩子。朱德还想给孩子取个名字，可因不知道孩子父母的姓名，也就把他难住了，只好叫做“这孩子”，于是“这孩子”三个字就成了孩子的名字而被叫开了。

在马泽迎精心照料和抚养下，这孩子虽然瘦成一把皮骨，却还健康，讨人喜爱，最终被马泽迎背到了延安。

孩子一周岁时，已经会走路，并且会叫马泽迎“爸爸”了。马泽迎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勇毅，希望他勇敢、坚毅，继承父母遗志，革命志向坚定而不动摇。

马泽迎收养不知姓名烈士遗孤的义举，在部队一直传为佳话。每当人们称赞他时，他总是谦逊地说：“无数革命者牺牲在战场上、征途中、刑场上、监狱里，他们的骨肉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作为战场幸存者，帮助烈士抚养遗孤是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，也是我们的机遇和缘分。我只有把他抚养成人，才能对得起牺牲的先烈。”

收做女婿

马泽迎的事迹，同时也感动了来自河北的抗大女青年郭智勇，她不顾少女的羞涩，主动表示愿意和同窗学友马泽迎结为秦晋之好，共同分担抚养这位烈士遗孤的义务。马泽迎接受了这份真挚的爱情。

1936年初，马泽迎与郭智勇结婚了。此后，虽然他们有了自己的亲生子女，但夫妻俩对勇毅并无二心，甚至常常护着勇毅，批评亲生子女。

转眼到了1956年，勇毅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。“勇毅也该结婚了。”这成了马泽迎夫妇的一桩心事。

很快，马泽迎夫妇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勇毅非常要好，在一起时，总是有说有笑，情投意合。夫妻俩遂想把亲生女儿许配给勇毅为妻。但郭智勇开始还是有些迟疑，怕别人说三道四。马泽迎解释说：“这怕什么，勇毅是红军烈士孤儿，组织上知道。别人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解释嘛。更何况，为了勇毅的健康成长，我们对他隐瞒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该到了挑明的时候。”马泽迎还向朱德汇报过此事，得到了朱德的大力支持。

于是，马泽迎夫妇向勇毅说出了多年的真相。听说自己是不知名的烈士遗孤，自己是“爸爸”收养的孤儿时，勇毅跪在地上泪如泉涌，他既为自己有这样的亲生父母而骄傲，也被马泽迎夫妇的义举所震撼。

接着，马泽迎夫妇告诉勇毅和女儿，想让他们成婚。情投意合的两人欣然答应。

婚礼于1956年10月18日在马泽迎家举行。朱德闻讯，亲自主持了婚礼，并向大家讲了勇毅的身世。

听了朱德的介绍，婚礼场上发出了阵阵赞叹和感叹。

当仪式进行到“三拜高堂”时，勇毅夫妇虔诚地向马泽迎夫妇鞠躬，并敬上了美酒。马泽迎这位出生入死、戎马倥偬的将军含着热泪，端起美酒徐徐站立，和郭智勇一起朝着西南方向缓缓地洒下了这杯酒并深深地鞠躬、再鞠躬、三鞠躬，他告诉九泉之下的战友：亲爱的同志，我马泽迎终于完成了你的嘱托，你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。

（据抗日战争纪念网、国际在线、《党史文苑》）

朱军：冲锋在前的战地记者

“他们去朝鲜了！”

1952年，正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朱军慌了，赶紧打报告，“我要回部队去。”

到一线去！无论是战士还是记者，这是她的信仰。

体工队挽留。朱军说：“首先，我的职业是记者。其次，我的爱人上前线了，我能在后方吗？”当时，她的关系还在46军的尖兵报。于是，她背着小背包，直接乘火车到了鸭绿江边，找到了军后勤部。

一张在朝鲜战场上的照片记录下朱军飒爽的影像：穿着厚厚的军装，戴着厚厚的军帽，腰间别着手枪。

从1952年9月至1955年的5月，她在朝鲜战场待了4个年头，过了3个冬天——

“那冬天真难过，真如大家说的冻得脊梁骨要结冰。那时，我穿着大号军装，里面塞了件部队的绒衣还冷得很。厕所都在野外，战场上的女兵，生活有诸多不便和艰难。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，白天黑夜敌机随时侵犯轰炸。我认识的战友就有在行驶的汽车上、火车上以及行进中遭到轰炸牺牲的。”朱军说。

她一个人住在一个能容纳一个班的大坑道里，对面山坡上是男同志和办公的坑道，下山上山要走十几分钟。朱军回忆那时的战地生活，“手枪子弹上膛，放在枕头旁边。坑道门口，我在里面堆上好多装过子弹的空木箱子。我们经常吃罐头，罐头盒子留着，放在木箱上，一推门，罐头盒子掉下来不就醒了吗？就想办法保护自己。”

有一次轰炸，把坑道口给震塌了，只有上边有个天窗一样的口子，还有点儿亮。那时，她正赶写一篇广播稿。“心想，反正他们会来救我的，就趁着那点儿光亮，坐在子弹箱子上面继续写。我刚写完，自己还看了一遍。”

外面来人了，使劲儿喊。朱军说：“我在里面，没死呢！”

“假如那个坑道口被封住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就赶快跑来帮我把坑道口挖开。我就是胆子大。”朱军解释。

朱军也曾遇到过在汽车上被追着炸。“后边的汽车翻了，我们的汽车跑出了轰炸区，幸免于难。”

她的爱人王嘉林，1952年入朝，是军保卫干部，后调到志愿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工作，直到1958年志愿军最后一批撤军回国。

“他多次遇险，真是战争的幸存者。”朱军讲道，“1953年，他带着100多人乘火车，遭遇敌机轰炸，伤亡惨重。他凭借一个老兵的战斗经验判断敌机俯冲、扔弹……迅速带领大家跳车、奔跑、卧倒……通信设备被炸毁，与军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月。他们步行绕道过江回到祖国，前方才知道他们还活着。”

听着她的讲述，你会理解，这位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多个部门负责人的她，为什么会始终像战士一样冲锋在新闻一线，执着无悔。

是战争，就会有伤亡，有牺牲。“我曾遇见一位副连长，头天还采访过他，第二天就牺牲了，被抬了回来。”朱军记得采访他时的对话——

“仗打完了你想干嘛？”

“你想干嘛？”

“我没想好，我还当记者，或者我去读书。你呢？”

“我想读书。”

“你读什么呢？”

“我特别喜欢历史，我要读历史学。”

“他被抬回来时，我看了就揪心地哭了，从没哭得那么伤心过。”

也有胜利的喜悦。朱军说，“1953年，我军驻守在‘三八线’西线，离开城不远。与我军对峙的敌军是李承晚某部、美军陆战一师等。当时，李承晚反对停战谈判，破坏和谈。在志愿军几支友军部队结束金城反击战后，我军接着对李承晚军发起反击战，三打马踏里反击战取得全胜。这是我军停战前最后一次反击战，担任主打任务的是136师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支英雄部队。”

朱军曾留有20多期和战友们出的志愿军尖兵报。后来停战谈判，报纸停办，她辗转到敌军工作部、宣传部。

“这段岁月让我坚强起来，更懂得了有国才有家。”朱军说。**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**

一张通行证 一段长征史

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纸质“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”，长11.2厘米、宽5厘米，上书“步哨同志 兹有袁国钦前往城内请通行 没委 华”19个字。这张满是岁月痕迹的通行证，见证着红军长征途中打土豪、筹粮款、分百姓的一段历史。

没收征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没委会）早在1930年便已成立，在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门、红军各级政治部、军区及地方武装系统均有设置，统一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没委会管理。《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收征发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纲要》规定，没委会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、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。

1934年，红军开始长征后，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和围剿，一度面临给养匮乏的困境。为筹措军需、保障后勤，总政治部重新规定红军中没委会的组织，颁发了《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》，规定“从步兵团起至师、军团、总政部，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，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”。红军没委会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，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；没收军阀、官僚豪绅财产，一部分供给红军，一部分就地分给贫苦人民。同时，没委会还负责宣传红军政策、扩大红军影响力。

长征路上，部队每到一处，没委会都要广泛宣传没收征发的目的和意义，并设立群众反馈意见箱倾听民众心声。通过群众检举和摸排调查，了解当地军阀、官僚、劣绅的财产情况，确定没收对象和没收数额，再发动贫苦群众，一起收缴地主官僚和反动军阀剥削人民所得的民脂民膏。同时，还向富商宣传党的政策，动员其为革命募捐。最后，由没委会对这些财产进行整理，留下红军必需品后分发给当地百姓。上文提到的通行证就是红军长征至遵义土城镇期间，为方便群众工作人员出入没委会，特意发放给袁国钦的，后经多次辗转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。

在进行没收与征发工作中，没委会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，严格遵守政策中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，与当地群众合作打击地主豪绅，共享胜利果实。红军在遵义期间，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，共没收了遵义城百余户反动豪绅、军阀囤积的粮款，仅反动军阀王家烈一家经营的盐行就查出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。当时，因食盐销路被军阀、地主、官僚所垄断，价格极其昂贵，贫苦百姓吃不起盐。于是，红军将没收来的食盐直接赠予或低价供应百姓。这样一来，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增强，军队的后勤补给也得到保障。

在筹粮筹款工作期间，没委会主任林伯渠要求部属严格遵守有关纪律，严禁出现乱筹措、乱没收的现象。在一次入村筹粮过程中，老百姓因听信国民党的恶意宣传，提前把粮食藏好躲进深山，林伯渠带着下属走了好几个村庄，才在一户人家的地窖中发现了两百多斤玉米。看到黄澄澄的玉米，官兵们喜出望外，立马就要往外搬，林伯渠却慎重叫停，让人先弄清这家主人的情况，如果是地主，就按政策没收，并留下没委会的告示；如果是老百姓，要按市场价格购买，并留下字条以表感谢。后经调查分析，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，最后按林伯渠的指示，把信和钱压在炕边，这才将粮食背走。

在我军早期革命斗争过程中，没收征发委员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不仅是红军在革命道路上筹措军需、保障后勤的重要机构，更是党和人民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。这张通行证的背后，既透露了红军后勤保障的艰苦不易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共享革命成果、巩固军民关系的宝贵经验。**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**

文人轶事

华罗庚巧护李寿慈

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李寿慈既是同乡世交，又是师生关系。

1935年秋，李寿慈来到清华园求学时主动寻找华罗庚。在交谈中，华罗庚告诉李寿慈要做到读书不忘救国，要在救亡图存方面多做些工作。

当年12月，有许多军警翻过清华校园的墙头，到学生宿舍区去抓捕爱国学生。几个凶神恶煞的便衣，命令在押的学生拿出学生证，他们对照着黑名单，凡名单上有的便当场抓走。由于李寿慈也参与了爱国学生运动，所以他也被列入抓捕名单之中。

当时李寿慈身上正好有一张可当身份证用的假借书证。这是一个叫王乃梁的外语系一年级学生借给他的。虽然王乃梁埋头读书，不太过问政治。但是他敬重李寿慈，说这借书证可能以后对你有些用处，就撕下自己的照片，换上李寿慈的半身照。没想到，在这危急的时刻还真派上了用途。

李寿慈机警地摆脱了军警的检查，来到了华罗庚的宿舍。不料华罗庚的宿舍里也早来了军警。此时华罗庚正坐在床上，三个军警正询问他什么。军警们见李寿慈只身闯入，大声斥问他是什么人。面对军警的盘问，李寿慈冷静而机智地回答自己来华先生宿舍的目的，并主动掏出“王乃梁”的借书证。就在军警盘查证件时，华罗庚故意高声说：“密斯特王，先坐下来歇歇吧！这几位长官，也不过是例行公事。”军警停下来听他们谈话，华罗庚又故意埋怨说：“有什么难题做不出，一大清早就跑来找我？胡适之先生早就告诫你们平日要‘多研究些学问’，你们平日念书大都吊儿郎当，现在临时抱佛脚来了吧！”

华罗庚骗走了军警，才松了口气说：“好险啊！”又问他那个“借书证”的由来，李寿慈如实告知，华罗庚不由感叹道：“这就是中国古话的‘得道者多助’啊！”**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**

张元济公私分明

张元济先生是著名出版家，曾长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领导职务，可谓位高权重。但令人敬佩的是，他却拥有公私分明的境界，把公事与私事分得清清楚楚。

对于当领导的人来说，请客吃饭最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，许多人便常常在这一点上公私不分，但张元济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点儿都不糊涂，他的儿子张树年在书中记述道：“父亲宴客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如果以公司名义宴客，就到外面菜馆，高层次的社会名流，则选择杏花楼（粤菜）、小有天（闽菜）、多一处（川菜），费用由公司支付；在家宴请的宾客都是熟客，以编译所同仁为主，费用由父亲自理。”

在电话费方面，张元济也不马虎，张树年说：“我家的电话是由商务印书馆装的，每月费用也由馆方支付，直到父亲1926年退休为止，以后电话费全由我们自己负担。”

张祥保是张元济的侄孙女，张元济很疼爱这个宝贝孙女，但对她的要求也很严格，据张祥保回忆：“我大学毕业后……我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阅读外文书籍，把内容摘记下来，供领导人参考，不必每天上班。那是在抗战年月，生活艰苦，人们都兼职。我应一位老同学之邀，去中西女中兼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叔祖（张元济）认为我花在兼课上的时间过多，为我起了一封信稿，嘱我向公司要求只领取半时工作的薪金，因为我不该‘尸位素餐’。”

张家是一个大家族，在海盐的族人有很多，所以，在商务印书馆中，张元济的族人不是一个也没有，但他从来不给予特殊照顾，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回忆说：“商务的老人告诉我，海盐姓张的在商务做事的不是没有，但一没有掌权的，二没有吃闲饭的，说明祖父主持商务工作时，在用人问题上严于律己。”

张元济先生虽然身居高位，却从不假公济私，一直严守公私界限，为公众树立了一个清廉的榜样。“公者千古，私者一时。”公正之心，是为公众利益着想，而私心则是利己的杂念。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！”能做到公私分家、严格遵守法度和纪律，这种公私分明的处世精神难能可贵。**（据《联谊报》）**

赵朴初填词赞教师

1979年9月，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在北戴河联合召开23个省市自治区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。会前，应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之邀，赵朴初特地为这次会议填词《金缕曲·敬献人民教师》，礼赞人民教师：

不用天边觅，论英雄，教师队里，眼前便是。历尽艰难曾不悔，只是许身孺子。堪回首，十年往事。无怨无尤吞折齿，捧丹心，默向红旗祭。忠与爱，无伦比。

幼苗茁壮园丁喜。几人知，平时辛苦，晚眠早起。燥湿寒温荣与悴，都在心头眼底。费尽了千方百计。他日良材承大厦，赖今朝，血汗番番滴。光和热，无穷际。

1985年1月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，将每年的9月10日作为全国教师节。闻此喜讯，赵朴初十分激动，他决定把6年前写的《金缕曲·敬献人民教师》重新工工整整地书写一幅，特别写明“一九七九年八月作，欣值本年九月十日教师节，录此以志庆祝。一九八五年秋，赵朴初”。民进中央征得赵朴初的同意，将此墨宝送去木刻水印，复制数十幅，赠送给民进的先进教师和民进中央委员。同年9月7日，中国佛学院召开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，赵朴初特地书写这首词悬挂在会场上，他不仅亲自上台朗读，还郑重表示：“为了表示我对所有教师的敬意，我把过去的一首‘金缕曲’重新写出来，作为礼物送给教师们。”

后来这首词越传越广，作曲家为它谱了曲，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曾将其作为重要曲目演唱，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一首歌曲。**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**